人文视点

浙江“非遗”传承人、斋号“容园”的竹刻艺术家叶瑜荪先生名闻遐迩，日前湖州文化人士顶酷热前往他桐乡住所拜望，不仅看到了他充栋满屋的藏书、感受他夫唱妇随的全国“最美家庭”之琴瑟相谐，也近距离观赏了他一批竹刻精品，更欣喜地听他讲述从艺路上“湖州人”“湖州竹”“湖州籍艺术家”对他的影响、帮助。今刊发他应约而撰的与湖州的“艺缘故事”，以飨文化爱好者。版面所限，文章刊发时有删节。

——编 者

湖州与容园竹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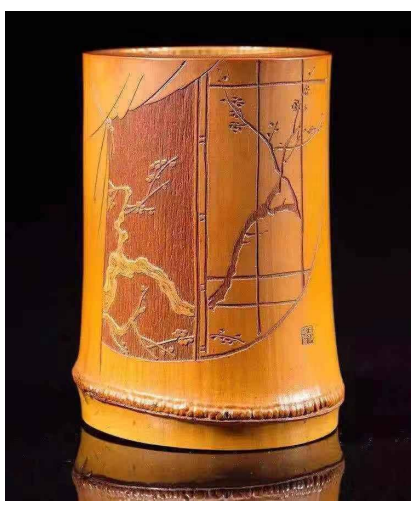
叶瑜荪

竹乡文化耀千秋

竹是亚洲的热带或亚热带季风区的标志性植物，我国东南各省都盛产竹子，形成了很多竹乡。湖州是竹乡文化最深厚的代表之一。吴兴一郡多竹山，除盛产毛竹外，其它竹类亦有生长。竹乡先民是最早认识竹性、最懂得用竹的人。从食竹、用竹到咏竹、画竹、刻竹，产生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竹乡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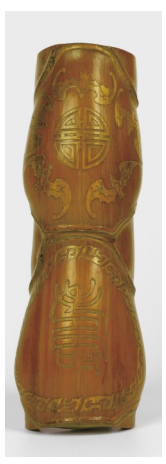
在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5000年前先民所制造和使用的竹编器物竟达200多种，有篓、席、谷箩、刀箨、簸箕等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具，也有捕鱼的“倒梢”（即“笙”）。这些竹编器物绝大多数是用刮光的篾条制成，编织工艺精细多样，已经达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高度。

天目山竹林



金西厓竹刻留青梅窗图

沙底吴昌硕篆书长寿臂搁



龟背竹『寿』字留青臂搁

叶瑜荪 刻

中国的书写工具有很长一个时期盛行竹笔，“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宋稗类钞·古玩》）。战国时出现了毛笔，而湖州的制笔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末期的秦代，蒙恬造笔被尊为湖笔之祖。经蒙恬改进提升的竹管毛笔，即是用箬竹、苦竹为笔杆流行至今的毛笔。湖笔能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首，与湖郡盛产笔管竹有着直接关系。至晋代“湖笔”已是当地一大文化产业。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文同“以尚书司封员外郎充秘阁校理知湖州”。文同性喜满山翠竹，风姿摇曳，优美无比，画竹成癖，日夕挥洒，终成中国文化史上画竹圣手。其画竹风格经苏东坡传承和弘扬，不仅开创了“湖州竹派”，还留下了“胸有成竹”成语。“湖州放笔夺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蹙然何处见生气？仿佛空庭月落时。”（柯九思《题文与可画竹》）“文湖州”之名流传千古。

湖州的文人书画家，从元莲花庄主赵孟頫到清末吴昌硕，都继承了咏竹画竹的文化传统。

清乾嘉以后，浙派文人竹刻兴起，湖州即是浙派竹人集中涌现的三个地区之一。仅褚礼堂（1871年—1942年）《竹人续录》所收就有六人。

韩潮，字蛟门，归安人。刻扇骨小行楷，可作数百字。刻前似不先写，乃用镌石章边款之法为之，亦不事修饰，一气呵成，自然活泼，无甜俗态。

朱宝骝，字又原，德清人。工书画，精刻竹，镌扇边多摹写金石款识。刻法仿韩蛟门一派。

蔡辛，字不群，别号薑白，归安人。工篆隶、刻印，善刻晶玉印，尤好刻竹，秘阁、扇骨皆自撰铭语，所作甚夥。

吴璠，字菊邻，湖州人。刻浙派，寓上海，善刻竹。

金绍堂（1880年—1965年），字仲廉，号东溪，出生于南浔承德堂金家。清末考中秀才，后留学英国，习机械工程。业余爱好刻竹，精细有法，刻诸家墨迹均极工妙，刻阳文山水花鸟可追踪吴鲁珍、周芷岩。

金绍坊（1890年—1979年），字季言，号西厓，出生于南浔承德堂旧家。初从长兄北楼学画，后从仲兄东溪学竹刻，不久即有出蓝之誉。所刻留青山水酷似张希黄。久客上海，终生潜心刻竹，是使留青竹刻文人化的杰出名家。1948年完成《刻竹小言》初稿，是一部传统竹刻研究集大成的重要著作。

此外，当代湖州竹人还有沈觉初（1915年—2008年），名觉，以字行，德清人。早年从石门吴待秋学画，兼习篆刻。后与唐云、来楚生游，从事刻印、刻竹、刻砚铭等。供职上海朵云轩收购处。刻竹以扇骨为主，多与海上书画名家合作，首创“单刀法”。

笔者学竹刻，受金西厓先生影响最大。又湖州出书画家尤多，在刻竹题材上，除摹刻西厓先生刻稿外，刻过白龙山人王震《无量寿佛》、吴昌硕隶书《汉书下酒，秦云炅河》、篆书《寿》字，费新我《弘一法师》像等。

九上天目采竹材

刻竹用材不同于竹匠、篾工所需，无法在竹材市场购得，须深入竹山，亲自搜求采伐，才能找到合用竹材。根据前辈经验，采竹多往天目山，“以其土沃而竹壮也。”

天目山位于浙江西北，东起湖州，西至浙皖交界，与黄山相望，绵延数百里。其余脉延伸至安徽绩溪、宁国、广德和江苏之宜兴、溧阳，面积广达1.2万多平方公里。天目山区如此之广，我该去何处选竹？最终我选定的是安吉大溪山。

选定去安吉采竹，原因有两：一、天目山主峰虽在临安境内，但紧邻临安的安吉竹山均属天目山北脉。又安吉是著名竹乡，是全国年产毛竹最多之县。二、大溪山中有熟友可帮忙。我有堂兄继荪是双林木器社制橹师傅，1970年时曾抽调去大溪山采伐橹料一年余，认识了许多山民朋友。也曾带我去山中游玩作客，遂亦成朋友。

第一次上山采竹是1979年，我找到安吉县山河公社大溪大队大荷山生产队朋友万嘉荣家。大荷山海拔千米，已是高山气候。当时竹山尚未分到户，全归集体所有。说明来意，嘉荣兄让其三子上山，按我要求选斫九寸毛竹一株，由万家按自用向生产队缴费。

第二次上山采竹是1983年11月，其时竹山已分包到户。事先写信告诉嘉荣兄，让他按我要求预选数株。我进山后一同上山验看，满意者再行斫伐。因是雕刻用材，竹皮不能有任何擦伤。只能去梢后肩扛至家，再锯断去节，劈成竹坯，以减轻携带重量。山民伐竹习惯，倒下去梢后都是沿山谷滑下，省力很多，但杆身都已擦伤，于雕刻无法再用。

入山采竹，学问很多。竹的生长地有山顶山脚、阳坡阴坡之分。采伐又须知时，入冬方可，取其精华内敛而虫蠹较少者。选竹又应讲究竹龄，过嫩质地未坚，疏松不堪用；过老文理粗糙，不耐精雕。故以三年之竹为佳。选竹要诀是：枝干挺直，周围停匀，净无斑点，表面平滑，文理细致，节稀而围大者。选定后齐根斫伐，斩去枝梢后肩扛至竹农家，节节锯断，倾泻每节中之竹液，不使略有存积，以免从内泛出黄斑。

竹坯携回家中，即先放入大锅煮沸一小时，见青筠转深，便知竹子表面脂汁已尽溶水中。然后捞出洗去竹上浮脂，从此可耐久藏，若有虫蠹亦死于沸汤了。后在山上嘉荣兄家见有煮笋干、山核桃的大锅，煮竹更方便，从1988年第四次采竹开始，竹坯烧煮都在山上一并完成。

自1979年至2001年，共上大溪山八次，相隔二、三年上山一次，每次采竹两或三株。早先交通不便，桐乡去安吉大溪要几经周转，舟车劳顿，颇不容易。当年入山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乘轮船至湖州，再坐汽车至安吉递铺，递铺有车到大溪。但班次很少，为早点进山，可先到白水湾，白水湾到大溪车较多。大溪到大荷山只能步行，好在路已不远。另一条路是从杭州走，武林门汽车总站有开安吉北林场班车，可在白水湾下车中转去大溪。

后几次开车进山，就方便不少，携带竹材也多。

1994年11月，嘉兴电视台为拍摄竹刻专题片，与我联系，要随同进山拍摄采竹过程。派出由陈伟力、陆明、陆晓勤等五人的摄制组，开车同行。不用从湖州或杭州绕行，而是直接西行，走新市、武康，从莫干山下往西进入安吉。那年正建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其中一段路走的是在建隧道。拍完采竹又到桐乡、石门拍摄刻竹和生活镜头。剪辑成片长30分钟的《竹品》专题片，赶在当年12月31日晚在嘉兴电视台首播。后经加工修改送全省电视片评比，获纪录片一等奖。并安排于1996年2月4日晚在浙江电视台“走进人家”节目播出。

2007年12月，嘉兴电视台钱加林兄为拍摄非遗《竹刻》专题片，邀我再次入山采竹。由学生陈淇青联系。改往安吉报福镇统里村拍摄采竹。后又介绍浙江卫视国际频道来容园专访。最终剪成20分钟的《江南寻“竹迹”》外宣专题片，于2008年2月29日在国际频道播出。这也是我第九次入山采竹。

之后，因精力渐衰，采竹均由学生上山了。

《刻竹小言》是良师

1978年12月，笔者结束14年知青插队生活，上调回城，因下乡时曾学过民间木雕，被安排进桐乡手工艺品服务部。领导问我会刻竹否？答：从未刻过，但可寻找资料试学之。

1979年时，中国竹刻正低谷期，很难找到能教刻竹的老师。我有幸遇到了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拙翁杨为义先生，向他求教竹刻之道，承拙翁热心指导，带我去上海博物馆库房部观赏馆藏竹刻。两个多小时细赏了数十件藏品。也第一次见到了金西厓先生作品，其中印象最深是一件《荷花》臂搁，用陷地深刻法为之。后我曾背临过此件作品，至今仍保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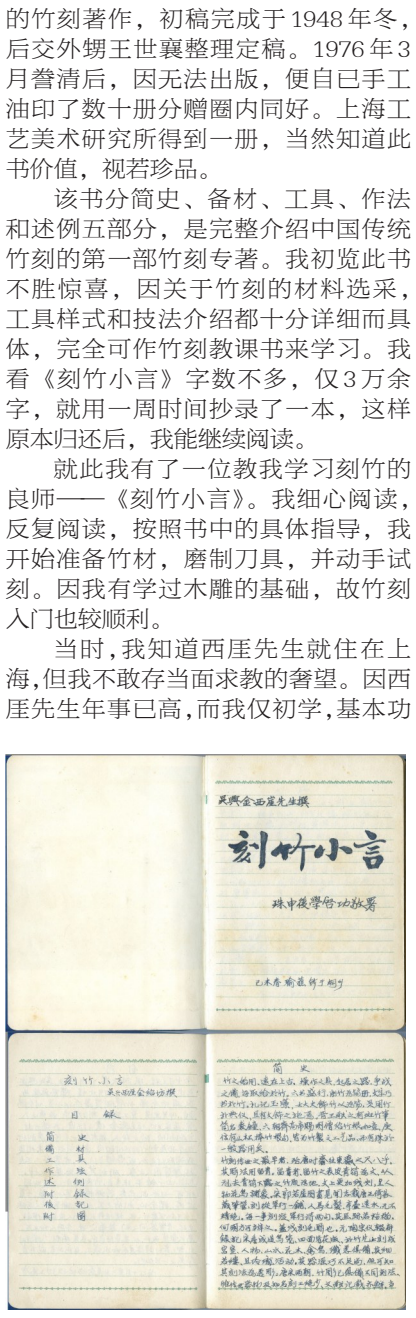
我问拙翁有何竹刻书籍可供阅读？他说竹刻书极少，所里有一本可阅读参考。于是他从所图书室借出转交我，因只此一本，要我按期归还。这是一本手工刻蜡纸油印的《刻竹小言》，蓝面线装古籍装法，虽是油印，但十分清晰。

《刻竹小言》是金西厓先生很重要的竹刻著作，初稿完成于1948年冬，后交外甥王世襄整理定稿。1976年3月誊清后，因无法出版，便自己手工油印了数十册分赠圈内同好。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得到一册，当然知道此书价值，视若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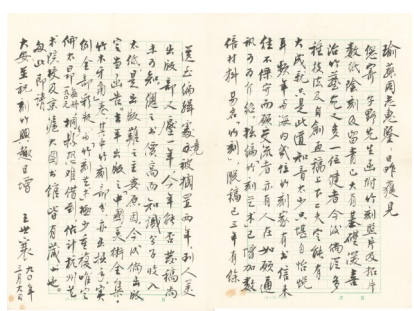
该书分简史、备材、工具、作法和述例五部分，是完整介绍中国传统竹刻的第一部竹刻专著。我初览此书不胜惊喜，因关于竹刻的材料选采，工具样式和技法介绍都十分详细而具体，完全可作竹刻教课书来学习。我看《刻竹小言》字数不多，仅3万余字，就用一周时间抄录了一本，这样原本归还后，我能继续阅读。

就此我有了一位教我学习刻竹的良师——《刻竹小言》。我细心阅读，反复阅读，按照书中的具体指导，我开始准备竹材，磨制刀具，并动手试刻。因我有学过木雕的基础，故竹刻入门也较顺利。

当时，我知道西厓先生就住在上海，但我不敢存当面求教的奢望。因西厓先生年事已高，而我仅初学，基本功不扎实，怎敢打扰老人。待学到一定程度，真有心得体会需要叩教时，才可去见老人。谁料当年8月4日西厓先生就归返道山，绝了我求教面聆之缘。然我已得老人之书，于心亦足也。



《刻竹小言》瑜荪抄本



王世襄1990年3月9日回复信函

1980年4月，经金西厓的外甥王世襄增补、编辑的《竹刻艺术》一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很快我得到了此书。虽然内容仍是《刻竹小言》，只增加了王世襄《试谈竹刻的恢复和发展》长篇调研报告，但书后附有很多竹刻图片和拓片，非常可贵，对照阅读《述例》时更易理解和体会，这是油印本无法相比的。

1989年初，我买到了国内印行的第一本竹木牙角雕刻图册——《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卷》，主编是朱家溍、王世襄两位前辈。在阅读王老所写《竹刻总论》时，我在文尾一条注释中读到了《竹刻艺术》一书已出增订本的信息。我非常兴奋，但经多方打听，去书店寻找，均无所获。不得已于1990年3月2日给《竹刻艺术》一书“序”作者王子野先生寄去一信，询问增订本之事。未料3月14日收到了王世襄先生来信。

王世襄先生是我所崇敬的文博学家，当代最权威的竹刻研究者。因我自认刻竹功力尚浅，还不敢登门求教，却不料王老先给我来了信，岂不让我惊喜过望！自此我与王老开始了通讯联系，蒙王老热情勉励，不吝赐教。《竹刻》一书至1992年6月才得出版，王老迅即签名寄赐。1994年12月，王老应邀去香港作“古代竹刻主要流派与当代竹刻家”讲座，特嘱我提供三件作品带港作观摩用。又数次为我题辞，王老成了我竹刻研习最有力的指导者。

叩谒澄园蒙指点

学刻之初，各地文化老人健在者不少，他们是传统文化的追踪者和守望者。澄园老人谭建丞系湖州耆宿，诗、书、画、印皆精，便是我很早求教的前辈之一。

1981年6月下旬，我首次去湖州马军巷春晖堂叩谒澄翁。闻知我在学习刻竹，澄翁颇感欣慰，连忙找出其少年时在学校手工课上的竹刻习作，并不无感慨地讲述了当年刻竹经过，对我学刻则鼓励有加。临别，留下了我刚刻竟请柏年兄书写的“古月有新姿，太空无宿云”句臂搁，以为留念，并请指教。澄翁在两个月后来信中仍不忘鼓励。

初学竹刻，闻人言：“木刻要深，竹刻宜浅。”亦有人说：“浅了缺乏精神。”我转而求教澄翁，他回信说：“盖镌刻学贵在不俗，刻之深浅各随所好而已。”不少前辈谓我：“竹刻完成要做拓片。”但拓竹较麻烦，初期学拓，均不满意，遂生懈意。告之澄翁，即复信说：“稿非拓不可，亦非留不可。弟作画半生多未自存一稿，以至今日人家要为弟举办一次展览，出一本专册都无法进行。刻竹较涂抹尤难，书画尚可摄影，竹刻即要留影，亦非先拓一帧不可。”就此坚定了我学拓心愿，并养成了每完成一件作品必拓印留存之习惯。

安吉竹种园中有十几棵珍稀的龟背竹，后有一棵枯萎被斫伐。因其稀有，被园长送给了澄翁。澄翁说：“此竹应送给容园，他有用。”1987年6月，澄翁应邀到嘉兴宾馆作画会老友。聚会毕，宾馆派车送返菰城，澄翁即将龟背竹嘱带至嘉兴，并致信于我：“……此竹很少见，故奉赠于君。可惜中裂，不能做笔筒了，或制臂搁何如？倘可制的话，则请为弟制一枚。上面还请大手笔看地位镌刻少许，精不在多。兄台大方家，必能设计。……臂搁也不必长，就其形随其势乃自然，弟只望一枚已足。”不久，嘉兴宾馆托人将此竹送到了桐乡吾家。我用两节剖为臂搁，取“龟寿”意，刻了寿字图案。于当年11月寄奉澄翁，以祝长寿。

澄翁书法苍莽雄浑，笔致古茂，更因所书多嘉言隽句，我喜欢摹刻。曾刻过他“济世当为天下雨……”联句、“忍默、平直”和“寿而康”等于臂搁。

澄翁为鼓励我刻竹，还为我题辞两帧，一曰：“竹解虚心是吾师，”一曰：“简册流辉。”殷殷之情，铭记难忘。

苕上漫笔

西亩街与益盛商行

李志斌

西亩村是安吉县天子湖镇的一个行政村。在村办公大楼的后面有个呈“井”字形状的古街，附近十里八乡的都叫它西亩街。2018年修建通向安吉高铁的道路时，将原来的204省道与新公路进行了整合，使原来的街道被冷落到了一边。从此，这条古街少了一份喧嚣，多了一份宁静。

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地方，然而在近代史上，它却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商业繁华时期。

据有关文字史料记载，结合当地几位百岁老人的回忆，约在清朝光绪年间，安徽绩溪有一位名叫益盛的葛姓年轻人从外地学徒归来，决定开辟自己的一番事业。遂在父母的帮助下，背起行囊，途经广德、泗安来到浙江省孝丰县（现安吉县）的西亩街经营油坊。几年后逐步扩大到酱坊、蚕坊、酒坊、糕饼坊等农产品加工作坊，名曰益盛店。由于经营有方，老少无欺，若干年后，益盛店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南北货、杂货、布匹、餐饮以及客栈等，遂改名叫益盛商行，但是老百姓还是习惯称它益盛店。到了20世纪初期，益盛商行又添置水田及毛竹、茶叶等林地近千亩，拥有资产与孝丰徽商周百万（周汝贵）不相上下。所以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南有周百万，北有益盛店”。可是此时的葛益盛业已年纪老迈，体力不支，便顺手将家业交由儿子和普、和清两兄弟打理经营，自己告老还乡，颐养天年。

西亩曾用名西茂，相传因竹木茂盛而得名。因茂与亩近音，故渐渐被人写成了西亩，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时称西亩里，属鱼池乡。明成化二十三年（1497年）划归孝丰县，称西亩镇。1940年属三安乡，1946年改称广安乡；1950年称西亩乡；1956年建立西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10月属鄣吴人民公社，同年11月，孝丰县并入安吉县，西亩又划归南湖人民公社。1961年10月重建西亩人民公社，西亩街为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医院、中小学、银行、粮站以及各种购销门市一应俱全。1984年1月改称西亩乡，后又并入良朋镇，现为天子湖镇西亩村。

西亩街南距孝丰城15公里，西北距文化重镇，吴昌硕故居鄣吴村5公里，西南距国民政府空军上将徐康良老家添锦村5公里。民国时期，益盛商行除了经营商业活动以外，还兼营邮政信件的转运业务，徐康良的来往家书都是经益盛商行转寄的。

历史上，西亩街一直处于交通要道的位置，是安吉、孝丰两县通往泗安和皖南广德以及苏南一带的必经之地。抗战以前，西亩街在北街一公里外的溪港村栈枋设有船

西亩街

埠。在那个陆路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商户们雇佣白竹排载着茶叶、笋干、蚕丝、竹制品等山货，以及益盛商行作坊里加工出来的农产品运往梅溪，然后搭上大轮船转运上海十六铺码头，再从上海带回泊来品在西亩街销售。

据村里老年人回忆说，江南一带曾有“无徽不成市”之说，即没有徽州商人参加就形不成商业市场。民国时期，在西亩、鄣吴、泗安等集镇上，随处可见徽商经营的店面，“徽”字招牌占据了主导地位。

徽商与晋商、潮商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拥有着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为中国小农经济走向市场化开启了先河。由于地处山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养不活众多的人口，因此徽州也曾经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由此可见徽州地区土地资源之匮乏，人民生活之艰辛。

早在东晋时期，徽商就已经开始萌芽。到了明成化年间，因为朝廷修改了盐法，给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徽州商人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盈利空间。他们便亲带亲，邻带邻，拖家带口四处寻求谋生之佳地。使徽商这一特殊群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延续到1954年国家完成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徽商才退出历史舞台，并告一段落。

徽商在西亩期间，不仅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还积极为当地铺桥修路，帮困济贫，在当地乡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在西亩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益盛商行联合当地富户一起，通过抗日民主政府，秘密向抗日前线捐款捐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

1946年孝丰开始修建孝丰经西亩、鄣吴到泗安的公路，益盛商行不仅积极捐出土地，还捐献了大笔钱款和物资。

徽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不但丰盈了自己的腰包，赚钱建设了自己的家乡，同时也疏通了全国各地商品流通渠道，刺激了客居地经济贸易市场的活力，提高了客居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广大的浙北地区素来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活跃，民风淳朴，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称。依山傍水的气候条件也与他们徽州老家相近。所以，徽商的足迹遍布整个浙北地区。他们一边经商赚钱，一边用积累起来的资金在当地购买土地，在繁华闹市区建造前店后作坊式的深宅大院。许多富起来的徽商，习惯觅一处山青水秀的风水宝地建造高标准的住宅大楼，为水墨江南添置了一座座青砖黛瓦的徽式高楼和一条条幽深窄长的青石小巷。

今日，美丽的安吉乡村随处可见“碧水蓝天马头墙，翠竹绿树映山庄”的独特风景，为大美安吉平添了许多历史厚重感，成为新时代特殊的文化符号和旅游亮点。使所有来安吉旅游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一股股浓郁的徽派文化气息。